

書評

反思王通、儒學與隋唐思想史 ——評李小成著，《文中子考論》

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，265頁。

傅揚*

王通（號文中子，584-618）¹是隋末大儒，也是個難以歸類的人物，他的生平與思想既反映了南北朝隋唐歷史文化的諸多層面，又有其獨特性。相較於王通的重要性，出色的相關研究並不多，王通本身的複雜性以及史料闕漏是首要難題，學界思考和研究途徑的侷限亦為要因。李小成《文中子考論》（以下簡稱《考論》）是近期對文中子進行較大規模研究的一部新作，正如書名所示，內容兼及「考」與「論」，而前者佔了較大篇幅。全書除〈緒論〉外，共七章，書末附有〈文中子年譜〉和參考文獻。透過《考論》，我們除了能在一些具體論點上得到不同於以往的理解，還可以進一步反思中國中古思想文化研究的方法問題。²以下先引介《考論》的內容，再就相關問題略陳己見。

全書以〈緒論〉開篇，回顧自唐至今的文中子研究。作者指出，唐代距離王通生活的時代尚不甚遠，累積不少記載王通生平和事蹟的文獻，為後代辨偽考證工作提供了良好基礎。宋代學者除了從學術思想角度評價王通，也對文中子其人其書發展出或信或疑的不同立場與主張。宋初學者大多肯定王通的存在，然自北宋中期司馬光（1019-1086）起，

*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生

1 學界對王通生卒年的看法並不一致，此據李小成〈文中子年譜〉的考訂。

2 本文無法全面回顧中國中古思想史研究的成果，事實上，為了批判性地開展未來的研究，「思想史」概念本身有必要再加以釐清，這個問題尚待專文討論，此處從略。

漸有人疑其真偽。懷疑的主因有二：一、《中說》非文中子自著，其中有錯謬；二、《隋書》無文中子傳記。明清時期的文中子研究多承宋代學者的思路，鮮見新說。近代以來，有不少學者對文中子下過工夫，以尹協理、魏明所撰的《王通論》成就最高。³透過近代以來的研究，大致上已可證明王通確有其人，並由此論及王通的學術思想。作者在總結本節時指出，學界對於王通的生平、交遊，以及《元經》、《續六經》的研究仍有所不足，《考論》一書則嘗試進一步開展、討論這些問題。

第一、二章分別考證文中子的家世及其生平。作者在第一章先以王通家族在西晉末年的播遷為斷限，區分前後為遠祖與近祖，並廣泛運用正史、文集、碑銘等資料，挖掘出目前可知的王氏先祖成員與其經歷。後半部分考察王通父親、兄弟、兒子和諸孫。作者先確定王通親屬的成員和長幼順序，再就搜羅所得的史料進行排比和分析檢證，尤其著重處理文獻記載的矛盾之處，最終描繪出這些親屬的生平概況。文中子的生平事蹟並不複雜，第二章便以生卒年、仕官經歷和隱居後的生活等主題進行考證。這些問題前人多有論及，作者的寫作策略是在眾多說法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或判斷，並注意到一些過去較少人討論的細部問題，如文中子隱居時期的遊歷生活等。

第三章考證文中子門人及其交遊對象。據一些文獻記載，文中子有許多門人是初唐名臣，但這些人並未提及王通，因此歷來都有人提出質疑，認為相關記載出於依託。作者在本章第一節便徵引自宋以來的這些看法，並提出他處理門人問題的主張。作者方法上的一個重要基礎是確認《中說》不是偽書，基於此判斷，他勾稽出《中說》裡出現的人物，依照遠近親疏，區分為「重要弟子」、「一般弟子」及「交遊垂詢者」，並廣引史料，說明這些弟子、交遊對象與王通的關係。作者發揮前人說法，認為這些人之所以不提文中子，甚至《隋書》沒有記載王通事蹟，可由唐代初期政治局勢中求得解答。總之，藉由分類、考證及相關辨析，作者認為王通弟子中確有為唐初名臣者，傳統相關說法基本可信。

3 尹協理、魏明，《王通論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4）。

第四章旨在整理唐宋時期各種與文中子有關的記述與評論。作者認為，文中子其人其書在隋代未見於著錄的原因有二：首先，文中子並未進入隋代的政治中心；第二，文中子自擬聖人的行為，得不到當時學界正統權威的認可。透過唐宋時期相關記載，作者認為文中子其人其書不僅存在，還曾有不小的影響力。作者盡心蒐羅包括序跋、碑誌、書信、評傳、筆記等資料，將它們分為文中子親友及弟子、中晚唐人、宋代書目文獻，以及宋代個人著述幾個門類，在書中大量直接徵引這些文獻，再附上作者關於文獻性質或內容的簡單說明，頗可看出歷代對文中子評價的大致面貌。

在第五章中，作者透過東漢晚期至南北朝末的學術發展，描繪出孕育並刺激文中子學說產生的背景。本章所謂的「儒學」，指的是經學和政治上的學官建置。作者以儒學章句繁雜、儒學玄學化與佛學化等角度，說明儒學的衰弱。又指出文中子生當隋朝統一的時代，對南北風尚不同的經學發展進行反思，最終提出自己的新儒學，其核心關懷是「重新恢復原始的儒學」（頁 143）。簡言之，作者認為文中子思想既反映了政治一統情況下的文化需求，也是數百年來儒學自身發展的結果。

六、七兩章分別針對學界著墨較少的《元經》、《續六經》進行考論。作者在第六章處理《元經》，首先要解決的是現存《元經》的真偽問題。作者檢證唐宋時期有關《元經》的記載，並論析宋人阮逸的交遊、經歷，合乎情理地指出阮逸不會刻意偽作《元經》，認為「把今流傳之《元經》完全定為阮逸偽作，證據並不充分」（頁 146）。為了進一步證實其看法，作者又舉出許多例證說明中國古代避諱問題的複雜性，認為過去以避諱角度論證《元經》為偽作的看法並不可靠。作者對《元經》版本的掌握體現在本章第四節，加強了關於版本討論的說服力；在後文說明《元經》注本有兩個系統處，亦可看出他對文獻的熟悉程度（頁 172）。在這些基礎上，作者又透過《中說》的記載，指出《元經》就像孔子的《春秋》意在接續《尚書》一樣，旨在接續文中子的《續尚書》，基本上承繼了漢代以來天人之學的傳統，其核心是道德褒貶，不能用歷史記載的眼光來看待它。

第七章討論王通的《續六經》（除《元經》外，還包括《續詩》、《續書》、《易贊》、《禮論》、《樂論》，以下仍簡稱《續六經》）。由於《續六經》早已散佚，學界對它們並不重視。在材料和相關研究缺乏的情況下，進一步討論頗具難度。作者的研究取徑有二：首先，他概括先秦漢晉南北朝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三禮》學的發展，描繪出文中子以前經學的大概；其次，作者整理《中說》中有關《續六經》的零散記載，再以前述經學的大致面貌為線索，將二者結合，說明文中子對六經的繼承與突破。作者以上述原則貫串分別討論《續詩》、《續書》、《易贊》、《禮論》、《樂論》的五個小節，試著說明它們的篇數、卷數、體例及思想，認為《續六經》明王道以接續《六經》的精神，和王通整體思想格局是一致的。

綜觀全書，《考論》所取得的成就多建立在廣泛的史料證據上。過去研究王通的學者，在文獻材料的蒐羅和考辨上已取得相當可觀的成績，不過這些整理多直接環繞著王通本人及其著作。作者在《考論》中，除了充分利用這些成果外，還廣泛蒐羅隋唐以降的各類資料，將關注的視野進一步的推展，書中對王通家世的考證，便是一個實例。《考論》有許多段落直接徵引大量文獻，並加以說明，這個工作也為後來研究者提供了許多方便。如《考論》第四章，透過與文中子相關的著錄與評論，描繪出各時代人心目中的王通形象。如果轉換研究重心，作者在此所提供的文獻，可資學者透過王通形象的變化，論析各時代思想文化的異同。如果文獻考釋的目的，是透過整理材料更深入地理解歷史文化，則《考論》在「考」的層面確實有不少值得稱許之處。可惜的是，作者治學勤奮，掌握了許多古典文獻的材料，對今人的相關研究，特別是歐美和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，卻未能妥善加以利用，不免美中不足。⁴

4 日文部分，值得參考的著作有〔日〕吉川忠夫，〈文中子考——とくに東臯子を手がかりとして〉，《史林》53卷2期（1970，京都），頁87-120；〔日〕市川本太郎，〈隋の大儒文中子の思想〉，《國士館大學人文學會紀要》第3號（1971，東京），頁199-237。英文方面，Wechsler的研究有華路藍縷之功，見Howard J. Wechsler, "The Confucian Teacher Wang T'ung (584?-617): One Thousand Years of Controversy," *T'oung Pao: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* 63:4-5 (1977, Leiden), pp. 225-272. 近期英語世界最值得參考

在考釋的基礎上，作者盡可能地拼湊已掌握到的訊息，以說明王通在思想史上的意義。作者從內外兩個角度切入，討論王通的學術思想。外部層次，指的是王通所處的時代環境，特別是當時的學術思想氛圍。文中子的學說是為了回應玄學和佛學支配思想界的現象，此點早為學界所認識，作者則更進一步條析南北朝經學家派的發展情況，並指出王通學術淵源之所本，讓外部層次的討論更加充實。為了切實把握王通的學術源流，作者勢須展示出王通思想的內蘊，即筆者所謂內部層次的分析。作者以《中說》為根據，由各方面努力重建《續六經》的體例、思想，這種做法頗有新意，也取得了前人所未言的成果。作者在《考論》中處理思想問題，絕非單純地堆砌史料碎片，而是將它們組成一幅拼圖，儘管殘缺部分仍多，但確實能呈現出作者所努力論證的王通形象：一位在長期政治和文化分裂下成長，有其自身學術淵源，以王道為己任，且欲力行實踐的儒家學者。

在李小成的努力下，《考論》在「考」與「論」的層面都取得了成果。但在研究方法和對歷史文化的理解角度等問題上，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。「《中說》一書基本非偽作」的判斷，是《考論》中許多考釋工作的基礎。關於《中說》的真偽，歷來討論已多，《中說》非偽作是一個重要的共識。但近現代以來的古史考辨工作早已清楚向我們展示，「偽書」與「偽（史）事」是不同層面的問題。換言之，考證辨偽的工作有許多層次，「《中說》一書基本非偽作」的論點，並不保證《中說》的內容便是信史，可用來建立歷史事實。

過去王通其人存在與否的問題尚未解決時，學者不敢也不願輕易運

的王通研究，見 Ding Xiang Warner, "Wang Tong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*Zhongshuo*: A New Evaluation of the Source Materials and Points of Controversy," *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* 121:3 (2001, New Haven), pp. 370-390. 陳珪和王國堯的英文研究亦值參考，見 Jue Chen (陳珪), "History and Fiction in the *Gujing Ji* (*Record of an Ancient Mirror*)," *Monumenta Serica: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* 52 (2004, St. Augustin, Germany), pp. 161-197; Kwok-Yiu Wong (王國堯), "Between Politics and Metaphysics: On the Changing Reception of Wang T'ung in the T'ang-Sung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," *Monumenta Serica: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* 55 (2007, St. Augustin, Germany), pp. 61-97.

用《中說》裡的素材。相形之下，晚近關於王通的考辨，證明《中說》於史有據，不少學者因此開始大膽利用它進行研究。然而，這些學者通常沒有考慮今本《中說》在結集、流傳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增補或誤入問題，更無法證明《中說》關於文中子及其弟子互動的記載確為歷史事實。就現有證據觀之，《中說》裡王通與不同人物（如幾位貞觀時期的著名大臣）的互動，出於《中說》編者刻意附會的可能性仍難排除。但在第三章中，作者並未嚴肅考慮這個可能性，而是逕將《中說》記載視為確鑿無誤的核心史料，再廣引資料，證成其說，此舉在方法論上有待商榷。又如作者在第六章試圖論證王通確實曾撰有《元經》，但在列舉許多證據後，所得結論也只能限制在「今本《元經》非全為偽作」的判斷上。這表示作者已自覺偽書與偽事分屬兩個層次，故對《元經》的實際內容採取保留態度。這樣的研究結果，仍不能說明應該如何利用《元經》進行更深入探索。這一方面是材料使然，一方面也暴露了考證方法的侷限。筆者認為，全然排斥《中說》及王通相關資料的可信度，或不加批判地相信其中記載為信史，兩者態度都過於極端，有必要加以修正。⁵

《考論》中對王通及中國中古思想史的相關研究，也有需要討論的地方。作者在第五章以「儒學玄學化」、「佛學化」等字眼，來描述魏晉南北朝的儒學發展，認為這種現象反映了當時儒學的衰微，因此王通可說是應運而生，進而開展出「新儒學」。儘管這一時期老莊之學、道教，以及佛學、佛教興盛是不爭的事實，但這一現象可否用「玄學化」或「佛學化」來說明呢？筆者認為，中國中古儒釋道的確交涉頻繁，儒學也從佛、道思想中汲取了許多養分，但仍不能用「玄學化」，特別是「佛學化」來說明儒學在此一時期的發展。如果作者確實對此論題有深刻的想法，應該嚴謹說明「儒學玄學化」、「佛學化」中的「儒學」的主體為何？「玄學化」、「佛學化」又表現於何處，程度如何？

《考論》中關於「儒學」範圍的判斷亦過於狹隘。書中所謂的儒學，

5 類似批評及對《中說》史料性質的反省，見前引 Ding Xiang Warner, "Wang Tong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*Zhongshuo*: A New Evaluation of the Source Materials and Points of Controversy," pp. 370-372.

指的是儒家經學。作者在考慮經學派別時頗為用心，值得稱讚。不過嚴格說來，儒學不等於經學，「儒學」一詞的範圍比「經學」要大得多，這個問題須在概念上加以澄清。⁶ 研治學術史的學者多半會同意，中國中古儒家經學的創造性及突破性，遠不如佛學或道教學理建構來得引人注目。這個判斷確實能說明一部分的歷史問題，但由此而生的是，學者往往沒有嚴謹地辨析儒學與經學的異同，以致忽略了這段時期與儒學有關的其他思想文化現象。

在此試舉一例，說明研究者區分儒學與經學的自覺。關於唐代經學，陳寅恪（1890-1969）認為，「唐太宗崇尚儒學，以統治華夏，然其所謂儒學，亦不過承繼南北朝以來正義義疏繁瑣之章句學耳」，⁷ 這段話用字極為精準，特別是「其所謂儒學」一語，很可以看出陳氏區分儒學與經學的自覺。過去所謂思想史研究的一個主要途徑，是透過大思想家及其著作，說明並建構他們的思想體系。對中國中古的儒學來說，這種思想研究的進路，至少帶來了兩個問題。第一，它侷限了學者的研究對象，上述將經學等同於儒學的現象便是其中一端；第二，現存南北朝隋唐的儒學典籍相對稀少，更使得這段時期的儒學研究成果貧瘠。⁸ 陳寅恪在另一篇文章中說過：「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，最深最鉅者，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，而關於學說思想之方面，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。」⁹ 這個看法頗具啟發性：如果我們能在經典著作中的學說思想和哲學觀念以外，更宏闊地考慮儒學的角色和歷史意義，應能更

6 朱維錚，〈中國經學與中國文化〉，收入氏著，《中國經學史十講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 10-13。

7 陳寅恪，〈論韓愈〉，收入氏著，《金明館叢稿初編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1），頁 321。

8 目前關於隋唐儒學最佳的通論性研究，應該是 David McMullen 的 *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88)。此書出版後，在歐美學界產生重要影響，迄今已有多篇書評，中文學界對此書的關注似嫌不足。中文的評介，可參考張廣達，〈評麥大維《唐代中國的國家與學者》〉，收入氏著，《史家、史學與現代學術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 298-301；原載於張廣達，〈歐美漢學論著選介〉，《漢學研究通訊》第 10 卷第 2 期（1991，臺北），頁 102-108。

9 陳寅恪，〈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》下冊審查報告〉，收入氏著，《金明館叢稿二編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1），頁 283。

深入理解中國歷史文化的種種樣貌。這是研治思想史的人都應該引為參考的深刻見解。

如前所述，王通既有其獨特性，又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歷史文化情態，我們究竟要如何看待他呢？囿於資料，關於王通本身，學者能說的也許已很有限，《考論》便是一個最新的嘗試。不過，如果把王通做為一個媒介，仍有可能推展學界對隋唐思想史的認識。就王通的相關資料來說，如果不拘泥於文本字面上的「真實性」，也就是傳統所謂的真偽問題，而把眼光放在促成這些記載成立的深層背景與動因，以及它們帶來的「效果」，我們便可能由王通其人其書，拓展出更豐富的儒學和思想史研究。諸如錢穆（1895-1990）以王通為中心，說明隋唐時期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思想，¹⁰或陳弱水以王通為例，闡釋中國中古士人的世界觀，¹¹都是很好的例子。

筆者絕非主張材料的真偽問題不重要，剛好相反，材料考辨仍是所有研究的基礎，這一點也是《考論》的主要貢獻。除了《考論》，李小成也嘗試由文獻考辨進一步探索學術思想史，如他關於北魏關朗易學的研究，便值得肯定。¹²追求紮實可信的材料，以開放宏闊的視野多方接納不同觀點，細膩深入地解讀資料及其語境脈絡，是思想史以至所有歷史研究都不可或缺的三個支點，但出於個人才性不同，學者在這三種傾向間不免有所側重，《考論》一書的學術貢獻與不足之處都可以說明這點。無論如何，《文中子考論》是近年對王通用功較勤的一部著作，除了書中許多拾遺補闕的具體論點和翔實的材料外，還可以促使學者反思中國中古儒學和思想史研究的相關議題。筆者相信這些面向是任何關心思想史研究的人都應該留心的。

（責任編輯：吳立仁 校對：李修平）

10 錢穆，〈讀王通《中說》〉，收入氏著，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4），卷4，頁1-15。李小成寫作《考論》時未引用這篇文章。

11 陳弱水，〈思想史中的杜甫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69本第1分（1998，臺北），頁12-15；〈墓誌中所見的唐代前期思想〉，《新史學》第19卷第4期（2008，臺北），頁1-28。

12 李小成，〈關朗易學考論〉，《周易研究》2005年第2期（濟南），頁30-39。